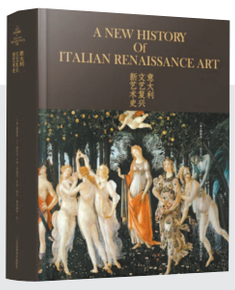
书人茶话

打捞文艺复兴的吉光片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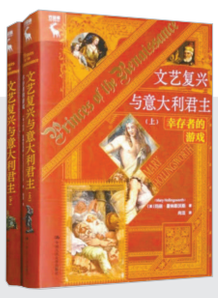
■ 格瓦拉

从“遇见拉斐尔”到“对话达·芬奇”，近年来打开各大城市的热门逛展清单，“文艺复兴”和它的关键词不时跃入视野——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米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即使是对西方艺术史知之甚少的人而言，它们也并非完全陌生。其实在这些拥有巨大光环的人名地名之外，“文艺复兴”还由更多的吉光片羽连缀而成，让我们不妨将焦点投向更多的意大利土地，看见一个更全面的意大利社会，以更好地洞悉文艺复兴的深远存在。

《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插图第七版）
[美]弗雷德里克·哈特 大卫·G.威尔金斯 著
章 华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意大利文艺复兴新艺术史》
[美]斯蒂芬·J.坎贝尔 迈克尔·韦恩·科尔 著
邵亦杨 等译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



《文艺复兴与意大利君主》
[英]玛丽·霍林斯沃斯 著
尚 洁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艺术变革，成就盛世

众所周知，米开朗基罗的挚友乔尔乔·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定义了“文艺复兴”。由此开创的人类历史上文艺的大繁荣，以艺术为笔，科学为墨，绘制了人类文明的辉煌篇章。《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插图第七版）是由久负盛名的艺术史学家、弗吉尼亚大学荣休教授弗雷德里克·哈特和匹兹堡大学艺术史和建筑史荣休教授大卫·G.威尔金斯双剑合璧、联袂奉献的。这本书以《艺苑名人传》为范式，以作品和艺术家为中心，梳理了整个文艺复兴的历史，是当今文艺复兴艺术史领域的经典著作，作为教材风行欧美50余年。

约1430年，皮萨内洛在同一张羊皮纸上绘制了一组杰出的舞蹈女郎素描，这表明了他所看到的其实是一名真实的裸体模特而非一尊雕像；因为古代没有任何作品如此真实地展现出连续动作。她流畅、优雅的姿态以及她解开秀发的动作，都暗示了画家想要唤起古代艺术中身体最为突出的特征，即活力。而桑德罗·波提切利著名的《维纳斯的诞生》创作时间要迟至约1485年。横空出世的《维纳斯的诞生》打破了中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对美的禁锢，体现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潮中美的自我完成与永恒不变的观念。无怪乎恩格斯也要发出由衷的赞叹，艺术复兴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革命，“就文艺复兴在发展文化艺术方面所具有的意义而言，只有以前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繁荣时代可以和它相提并论”。

这些新的技术和手法不仅丰富了绘画的表现力，也为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细数着诸如皮萨内洛、波提切利以及无数艺术家的变革，才催生出了站在巨人肩上缔造更绚烂艺术世界的文艺复兴三杰：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文艺复兴的天空至此群星闪耀，不朽的艺术之美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么，单凭艺术家的天赋，就能把文艺复兴的拼图严丝合缝地拼凑出来么？

答案是否定的。

艺术赞助人，推动发展

厚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新艺术史》由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斯蒂芬·J.坎贝尔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系主任迈克尔·韦恩·科尔合著而成，也让我们得以将目光从大艺术家身上转移到了艺术赞助人这个群体，他们是天才艺术家们最好的辅助和支持者，也是他们为文艺复兴注入了生命力。

敢标榜自己“新”的艺术史，必然有不同于前人的重大发现和探索，以及融合新研究成果、新研究方法的过人之处。这就和前文提到那本经典教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前，围绕艺术家等单一个体来叙述，是艺术史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这本“新艺术史”以时间为切片，将200年的文艺复兴历史，每十年做一个章节加以细致的研究，是为一新；摒弃了传统的传记体的艺术史写法，转而讨论艺术的功能、社会意义、生产方式、制作地点、赞助人的利益、观众的反应和艺术家角色的变化，是为二新；在关注政治、经济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艺术的传承；在关注艺术发源地传统中的独特性同时，也兼顾了意大利各城市之间出现的共同趋势，是为三新。

影响深远的《艺苑名人传》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所有进步的艺术看起来都是佛罗伦萨式的。长久以来，文艺复兴艺术的早期历史也的确一直把佛罗伦萨视为中心。我们知道美第奇家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而在美第奇家族艺术赞助行为肇始的时候，佛罗伦萨已经有很多银行家作为艺术赞助人活跃于历史的舞台上了。帕拉·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1372—1462）是当时的佛罗伦萨首富。《意大利文艺复兴新艺术史》中提到他是一位博学的银行家，他的财富帮助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斯特罗齐体现了共和制的资本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创造了这座城市对艺术的需求，支撑着思想生活，鼓励着创新眼光。艺术家们极其华丽的创作手法吸引着帕拉；反过来巨额的艺术资助让艺术家们得以用奢华的手法来呈现自己梦寐以求的题材。

被米开朗基罗称为“天堂之门”的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大门设计者吉贝尔蒂，就是在赞助人不计成本的资助下，完成了自己的艺术野心，他在夸耀自己的成就时，这样写道：“我被允许使用我认为会带来最完美、最华丽和最丰富效果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委托……在一些场景中，我放置了大约100个人物，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艺术赞助人们，在攫取巨额财富，促进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繁荣的同时，始终不忘反哺艺术家，为文艺复兴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是催生天才艺术家的强力催化剂。那么艺术赞助人这块肥沃的土壤，又是怎么绽放独特认知与宽广视野之花朵的呢？答案都指向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根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构成底蕴

英国历史学家玛丽·霍林斯沃斯的《文艺复兴与意大利君主》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她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15—16世纪意大利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态，将君主们的政治斗争与文艺复兴的光辉历程相结合，开辟了一个洞察那个充满生机与活力时代的新视角。意大利君主们的政治野心、文化追求和慷慨资助共同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兴起和发展。

15世纪上半叶，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朝的君主阿方索，在他的宫廷中雇用了一批人文主义者担任其政治宣传员、秘书、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对人文主义的支持给阿方索的宫廷带来了持久的声誉。他对古代历史的热爱广为人知：他每天固定留出一个小时来听人文学者读书，这也被称为“读书时间”，即使在行军打仗过程中也同样如此；他在大病疗养期间，让他们给自己读一本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记。他有一枚徽章设计为一本打开的书，上面有一句双关语“Liber sum”（我是书/我是自由的）（Liber在这里可以指“书”或“自由”）。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他信奉“奥古斯都、图拉真和哈德良皇帝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为他们对人文学者的赞助和培养”。正是阿拉贡王朝一代代对知识的敬重，让那不勒斯成为了意大利乃至欧洲文化与艺术重镇之一。

弗雷德里克·哈特认为：每一个城市的艺术故事都有其内在的完整性，并能够与这些城市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发展相联系。而通常会被忽略的一些小城市，却出人意料地秉承了这种对文化与知识的重视，让自己拥有足以名垂青史的荣光，成为文艺复兴拼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意大利北部小城费拉拉，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城市，以其艺术、文化和建筑成就而著称，但费拉拉侯爵的领地也仅限于费拉拉城及其周边地区。费拉拉侯爵莱昂内洛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恢复费拉拉大学，该大学成立于1391年，但由于财政困难当时已完全关闭。1442年1月17日，也就是他父亲去世三周之后，新侯爵就筹措资金，招募教师重新开办费拉拉大学。费拉拉大学重新开办后，学生人数激增：15世纪30年代，平均每年只有34名学生入学，十年后这一数字达到了338名。也正是这一批批大学毕业生，点燃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火种，他们鼓励人们追求知识、艺术和科学的进步，是文艺复兴不可撼动的基石。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国家的君主不同，莱昂内洛没有在城堡等传递王朝权力的方面花费过多，他更热衷于成为文艺复兴文化的第一批赞助人，以其谦逊的方式投入对古典文化的学习和复兴之中。

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地图复杂多变，城市间的联盟、战争和领土变更频繁发生。同样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城市曼图亚是一个相对独立却受到某个强大势力控制的城市，曼图亚勋爵詹弗朗切斯科也是人文主义的早期赞助者，他收集了一大批西塞罗和其他古典作家的手稿。他邀请人文主义者维托里诺·达·费尔特雷在曼图亚开办了一所学校，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第一所教授人文主义知识的学校。

这些在地图上容易被忽略的城市，却成就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教育、艺术赞助最初的垂范。莱昂内洛和詹弗朗切斯科共同获得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头两名赞助人的荣誉。他们展现了罗马帝国形象的灵活性，不仅为学识渊博的鉴赏家、也为军人统治者提供了可资模仿和借鉴的范式。这些人文主义赞助人，这些城邦的君主，在戎马倥偬和血腥厮杀之余，也慷慨出资建立大学、滋养人文主义学者，为文艺复兴的勃兴建立了夯实的根基和丰沛的土壤。

文艺复兴注定是会被人们一直讨论下去的话题，当今人类艺术的创新与变革、文化的传承与迭代之路，都可以从中得到借鉴。打捞文艺复兴的吉光片羽，看见更丰富和全面的文艺复兴，才能为我们照亮艺术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前路。

乌菲齐美术馆的《维纳斯的诞生》（图源：视觉中国）

在读

高手是这样看书、写书的

——读阎晶明《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

■ 王锡荣

翻开阎晶明的《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读了第一章，我就知道，这是高手！因为他的撷取资料功夫、主题提炼功夫，以及表达能力，都极出色。对一些大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疑难问题，在他笔下就脉络清晰、要言不烦，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比如说鲁迅与陈独秀是不是有过直接接触的问题，鲁迅自己说自己在陈独秀邀去参加《新青年》编辑会议商讨编辑方针的会上见到过陈独秀，也由此认识了李大钊，但有人根据周作人的说法，认为鲁迅的说法是“小说”，因为他们是“客师”，不参加编辑会议的，而且鲁迅也没有在日记里记载，因此认为鲁迅和陈独秀没有见过面。对这样难以定谳的问题，阎晶明在简要列述最直接、最能说明问题的不同观点后，表示：“鲁迅和陈独秀都没有单独到对方住处访问过，但他们在会议或者活动的场合见面应是情理之中的事”，理由是“因为鲁迅显然对陈独秀的性格还有文章之外的判断。这种判断让鲁迅觉得，自己和陈独秀不大可能成为密切往来的知己，相互之间也并不主动热情，但在精神上是有诸多共鸣的”。既表达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也顾及了各方意见。坐实见面没有实证，否认见面也证据不足，这样的分寸就刚好。无论学术界还是大众读者，都可以接受，也庶几近于实情。

再读下去，发现书中所谈到的问题，全都是我所感兴趣，并且也或多或少做过一些探究的问题，比如陈赓与鲁迅见面问题，鲁迅与毛泽东、周恩来、方志敏等的关系问题等，我都算下过一些功夫查考稽核的，很多问题我也没有、也不敢下结论，而阎晶明的写法，不仅删繁就简，直面核心焦点，而且提升了站位，让读者从一个更高的立点上来看这些问题。比如谈鲁迅与陈赓见面问题，这事更加扑朔迷离，不但见面时间至今难以确认，而且当年亲身陪同人员之间还出现争议，更加离奇的是还出现了两次见面的说法。对此，作者没有陷入争论的漩涡，也没有执著于某种观点，而是取冯雪峰和陈赓的意见：见面几次不是关键，故事的核心是“鲁迅对红军及其战斗的关心、关注”，“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文学史、革命史上的佳话，故事的主题不因细节的枝生、歧义的纷呈而改变”，让读者更多关注事情的核心意义。再如谈方志敏与鲁迅，文章仅七八千字，不仅把一件学术界争得不可开交的疑难悬案梳理得了了分明，而且在新的立点上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鲁迅与方志敏关系的渊源、鲁迅对此事的思考，以及鲁迅这样做的意义有如是的感悟：“毋庸置疑的是，鲁迅以他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在中国革命史上非常重要、意义极为特殊的事件中了……将方志敏文稿接收下来，转移出去，既是鲁迅直接参与革命的一部分，也是将文学的火种传承下去的一次特殊行动。”而方志敏敢于将这些东西交给鲁迅，也是“出于一种天然的信任”，于是将鲁迅和共产党人的肝胆相照、心灵相通，说得分明可见。

而对于毛泽东与鲁迅的关系，基本事实虽然大家已经梳理得差不多了，但各种说法就更多，阎晶明用最简洁的笔法讲述了各种观点之后，却并没有止步于二人生前的关涉，而把目光延伸到鲁迅逝后的40年。同样是对于史料的铺排，他更加简要，但却也更全面，运用了类乎“白描”的手法，既简捷又清晰，该点到的都点到了，可谓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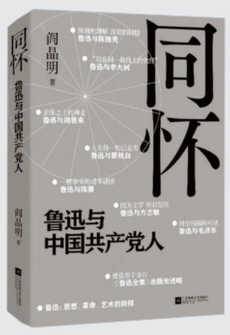
读这本书，有时候感觉似乎并无新材料，但却处处有新意。很多材料是以往的讨论中大家已经提到的，但他又不拘泥于材料，而是肉眼可见地换取一个新角度来反观它，而这个新角度往往就是更高的立点，让人读来更有感触，更有启迪。比如对于鲁迅与瞿秋白，他认为：“鲁迅视瞿秋白为知己，并非只是意气相投，才情互赏，实在还有共同的事业可以合作，因而相互依赖，互为支撑。”由此又延伸到“认识鲁迅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往来关系，对于更全面地了解鲁迅生平，认识鲁迅思想，了解鲁迅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以及他在文学创作上试图做出的努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也不无自得地表示：“这样的视角，之前的研究，包括鲁迅传记中，所涉及相对较少。”我想这正这显示了他的“新”和“高”。我觉得这个自我评价是合乎实际的。所以我说这本书是既有高度又有深度。

但这本书的还有个更为难得的特点，就是明白晓畅，轻松易读。全书拉家常式的聊天笔法，把读者拉进了一个乘凉聊天的场域，虽然聊的是不乏高大上的话题，其中充满曲折、吊诡甚至惊悚的情节，但却线索清晰、清新可读。读这样的书，不但效率奇高，而且并不费劲，极有读书之乐。很多问题，在我辈“考据控”笔下繁琐冗长的爬梳剔抉、要用好几千字才讲得清的事，到了阎晶明这里，三下五除二，几百字就讲清楚了，也是达到了一种化境。所以我说，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既专业而又通俗。

最后，重点来了。阎晶明说，他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看了我的《鲁迅生平疑案》和其它一些相关书籍，触发了他的兴趣，然后写了这本书。然而在我看来，他却是把相关话题的探讨推上了一个新高度。我的书，常是局限于史实本身，津津于一些细节问题的纠葛，他却跳出史料看史料，跳出是非看是非，从已有的庞杂琐细材料中抽取精华，在不丢失原材料精髓、不隔断历史脉络的同时，简要列述史实，重在阐发新意，让读者既能快速了解事情概貌，又能有所感悟，比单纯稽考史实的写作又进了一个层级。

这就是高手。全面观照已有成果，而不限于既有资料，善于提炼，长于出新。高手就是这样看书、写书的。

王锡荣，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人文学院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鲁迅文化基金会首席专家、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等职



《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
阎晶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好书过眼

“迂夫”何以伟大？

■ 沈祖新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赵冬梅 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把司马光称为“迂夫”，是一次创新，更是一次冒险。作为一位在公众视野中颇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司马光的形象，似乎已经趋于固化。他是“砸缸”故事中的机智孩童，是写出《资治通鉴》的历史大家，是与王安石分庭抗礼的政坛老手……这一切，好像都和“迂”毫无关系。《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一书，正是对这种固化印象的反驳——通过对司马光的人生经历的追索，提炼出“迂”的核心性格，在政事与人事的铺展与融合中，让宽容与执拗的性格特征得以显豁。

作者赵冬梅教授以丰富的史料为基底，以卓越的史识为牵引，以“同情之理解”为态度，在图画与文字的相互阐释中，缩短读者与历史之间的距离，为读者的阅读奠定感性基础；再通过平和的叙述中完成对历史人物的还原与塑造，在对“迂”的呼应中，让这份对宽容的向往与对执拗的同情得以传递，更令我们领悟到司马光的人格精神的伟大。

在本书的“目录”之后，有一幅司马光的画像和一首司马光的诗作《自题写真》。画像中的司马光，身着红衣、手持牙笏、黑须拂面、皱纹累累，俨然是身居高位的政坛领袖，清癯的面容流露着威严；但是在诗作中，他不仅说自己“黄面霜须细瘦身”，更自言“骨相天生林野人”。庙堂与“林野”的反差，不仅充盈着司马光的人性弧光，更是赵冬梅写作此书的一个方式——在图画与文字的相互阐释中，拉近读者与历史的距离，以尝试对司马光的人与事进行历史性的“还原”。

在感性印象与理性认知的双重加持之下，司马光的性格渐趋丰满，宽容与执拗的性格特征最终融合为意蕴深厚的“迂”。在赵冬梅笔下，“‘迂’是司马光的生命底色”，它是一种本色当行的朴素，也是一种坚定自我的持守，还是一种咬定青山的韧性，更是一种纯性无杂的善意。这种“迂”，让司马光在面对王安石改革时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以至于在后世落了个“保守派”的污名；也是这种“迂”，让司马光在暮年重返朝堂时，受惠的百姓都夹道恭送。正是出于对“迂”的生命底色的敬重，司马光在赵冬梅笔下获得极富生命力的呈现：在叙述到司马光为好友邵必送行的时候，插入了一幅明代的《山庄高逸图》，并在图像的注释中写到“图中客舍内有两人把酒对坐，像在话别，正如司马光以一杯薄酒为老友邵必送行”。古朴的图画中是淡远的山色，介绍的文字透出浓浓的友情，寥寥数语，司马光对老友的不舍以及对友谊的重视，都跃然纸上。

司马光的“迂”，表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但作为一个非同凡响的历史人物，这些个人的点滴，放在历史的宏阔背景之下，既显得微不足道，又变得举足轻重。因为在历史的现场，个人的选择与行为，很可能成为对历史进程的反作用。这也成为历史写作必须关照的部分，作为资深历史研究者的赵冬梅显然深谙此道。她在政事与人事的融合中铺陈司马光的从政生涯，在政治与生命的呼应中，延伸出关于“宽容”与“执拗”的辩证。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的关键事件，也是讨论司马光时必然涉及的内容。对待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既是司马光的政治思想的体现，更是其人格特色的彰显。在写作这一部分时，赵冬梅也有意识地注重政事与人事的融合，让政治行为与生命性格相呼应，避免了让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成为冰冷的利益角逐、干枯的观念之争与偏狭的权力之战。赵冬梅点出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人生状态与性格特征：王安石意气风发、颇受信任，但也狂狷任性、唯我独尊，变法为朝廷带来了实打实的收入，但也促成了利益集团的形成。与之相比，司马光老成持重，但在为国家创收方面，的确不如王安石。这种对比或许是每一位皇帝的梦想：大臣分为两派，各自竞争又相互制衡，皇帝统揽一切。但是，作为一位清醒的历史研究者，赵冬梅敏锐地反问“能否实现”？这是对古代封建君权制度的反问，更是对人性的反问。

“爱民”是司马光政治思想的重要方面，甚至是核心内涵。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理由，就在于百姓可能沦为被剥夺的对象，而非“惠爱”的对象。并且，变法的峻急可能会招致“制度的破坏、秩序的瓦解”，覆巢之下无完卵，以百姓为本的儒士司马光，又怎能不心生忧虑呢？这或许就是司马光“迂”的地方，他有持守，有保留，必要时挺身而出，“执拗”地坚持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儒士的政治理想，更是“爱民”的朴素情感。为此，司马光不惜“执拗”，但更会“宽容”。这种“宽容”，依然是“爱民”思想的延伸，要给百姓生息的空间，要给朝堂言说的空间。但要主持朝政，又必须有统一全局的能力，而这，需要实打实的手段与策略，非威望和愿景所能及。

对于司马光而言，“宽容”与“执拗”相生相伴，既两厢情愿，又相互冲突，这也让晚年的司马光在成为“司马相公”后，陷入了尴尬的“宽容悖论”中。或许，对此的敏感与无奈，才是让其发出“骨相天生林野人”的感慨的原因吧。

对“迂”的生命底色的提炼，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历史态度，更是一种用生命贴近生命的回馈。但对于历史作品，这便是一个风险之举——回望驳杂斑斓的历史时空，一个“迂”字，如何能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概括呢？这既需要史料的积淀，更需要史识的牵引，而这两点，正是此书的闪光点，二者的相互成全，让本书既富有历史性，又富有思想性。

赵冬梅对司马光晚年陷入的“宽容悖论”的发现与阐释，是本书的精彩之处。这既是基于史料而得出的客观结论，也是通过历史而达到对人性的深入讨论，是一种充满个性与温度的史识。在作者看来，“宽容悖论”指的是司马光对“宽容”的“执拗”，即“在政策层面，主张宽容政治的司马光最终将导向誓死捍卫个人立场的司马光”，换言之，“宽容”的本意是商讨，是对不同政见的关注与尊重，但当其走向极端时，“宽容”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独裁”，因为“在司马光的眼里，最接近正确的，当然是司马光的‘己见’”。

这样的观点振聋发聩、令人深思。作者没有沉醉在司马光的人格魅力中，而是清醒地思考、理性地认识，呈现出司马光作为一位政治家的缺陷与不足。但也是这些内容，成就了司马光的人格魅力。也正是因此，在赵冬梅的笔下，“迂夫”司马光才堪称伟大。